

云冈石窟的金代修建工程

辛长青

(《北朝研究》编辑部)

笔者曾就云冈石窟的辽代修建工程作过一番粗浅的探索^①。

继契丹人之后，女真人对云冈石窟也作过修建。

本文试图就云冈石窟的金代修建工程作大致探讨。如：金代云冈石窟的外护工程的经过并如何与今日云冈石窟对照；金代云冈石窟“皇统工程”的主要内容和今日云冈石窟的对照；云冈石窟和金史的关系；云冈石窟住持沙门在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女真人和佛教文化的关系等等，也都是云冈研究中加以解决的基本问题。

一 关于金代在云冈石窟修建的资料

迄今所知，记叙金代在云冈石窟修建工程和经过的文字资料仅见《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载^②（以下简称《金碑》）。

兹摘录有关金代修建云冈石窟的资料如下：

1. “……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晓喻其兵（军），不令侵忧。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慧大德号”。

2. “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此则皇

朝外护之大略也。……”

3. “皇统初，缙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法师住持。师既住锡，即为化缘。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奂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皇统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

4. “师又以灵岩古刻既为灰烬，护国大碑又复摧毁，胜概不传，居常叹息。欲表前踪，以垂后世，乃斲巨石，谒文于予。予既闻师名，又嘉其志，遂不复辞，为摭实而书之。师名禀慧，姓王氏，弘州永宁人。幼于天成县幽峰院出家受具，自十八岁讲华严经、摩诃演论，辨析疑微，听者常数百人。四十五散徒游方，即其所传。天眷元年，奉圣旨传菩萨戒。皇统三年，转运司定充本寺提点。申行台尚书省，继准唐堂帖。师性明悟，威仪端重，一方钦仰，建化之功颇多。至于石窟为最玄。”

5. “皇统七年，夷门曹衍记并书。传菩萨戒提点大石窟寺沙门禀慧助辩经武将军前西京军器库使骑都尉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庆祐……”

二 对以上五则资料的考证

《金碑》是研究云冈石窟兴衰历史等方面的“绝好的参考资料”^③，同样《金碑》又是研究金代云冈石窟修建工程的珍贵依据。

纵观以上所引关于金代修建云冈石窟的五段资料，可获得如下印象，金代对云冈石窟的修建工程基本可归纳为两大部分。一、金代在云冈石窟的“外护工程”（即第一期工程）。其中“外护工程”又包括：1. 天辅六年（1122年）的“守护”和对云冈石窟提点僧的加封。2. 天会九年（1131年）的“改拨河道”工程。二、金代在云冈石窟的内修工程（即“皇统工程”或曰二期工程）。“内修工程”又包括：1. “内修工程”的来由；2. 工程前后所需的时间；3. 修建工程的规模、布局；4. 工程所用之经费；5. 主持工程和尚的简介；6. 为何刊石立碑。即《金碑》的大体说明等。

为了更准确全面地了解金代在云冈石窟的修建工程，现对以上所引五则资料具体考证如下：

1. 对金代晋国王首次到云冈时间的考证

查《金史》，金天会十四年前被封为“晋国王”，“兼都元帅”的只有宗翰一人，“汉语讹为粘罕”^④。金天辅六年（1122年）“三月，……辽主奔西京；宗翰复追白水泺（山西省天镇县西北），不及，获其货宝。己巳（阴历三月初十，阳历4月18日），至西京。壬申（阴历三月十三日，阳历4月21日），西京降”。“乙亥（阴历三月十六日，阳历4月24日），西京复叛”^⑤。由此可知，宗翰忙于战事奔波于战场，在三月是无暇领略云冈石窟的。“四月辛卯”（阴历四月初三，阳历5月10日）宗翰又率金军“复取西京”^⑥，辽代西京守将耿守忠“败走”，“其众歼焉”^⑦。至此，“西京遂陷”^⑧，金军彻底占领了西京。故宗翰游览云冈石窟应是金天辅六年（1122年）四

月以后的事了，即《金碑》所记“大军平西京”的时间。

从《金碑》所记推敲，金军“平西京”后，宗翰不止一次到过云冈石窟。宗翰虽为武将，叱咤疆场，但喜佛，赞叹云冈石窟之宏伟，故首先令军队保护云冈石窟，免得云冈石窟再遭破坏，这是宗翰到云冈石窟办的第一件大事。宗翰到云冈石窟办的第二件大事是奏准皇上批准云冈石窟寺住持沙门为“提点僧”“禅紫衣”并封为“通慧大德号”。按《大金国志》卷36记：“……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纳，县曰维那。披剃威仪与南宋等。所赐号曰‘大师’，曰‘大德’，并赐紫”。因此从金皇主所赐封号来看，天辅六年后，云冈石窟寺就已是皇家寺院的规格了。

2. 对改拨河道工程的考证

“九年”系指金天会九年（1131年）。宗翰“天会十四年薨”^⑨。

金占领西京十年后，社会日趋安定，生产日趋发展，进行云冈石窟的“外护工程”是完全可行的。宗翰“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其原因是武州川水“近寺”，“恐致侵啮”。这一点可以从酈道元的“山堂水殿”中的记载中得到印证。从北魏建云冈十寺后，历经唐、辽几代，屡建屡修，屡遭兵火，到辽末金初，云冈石窟寺院建筑已“扫地无遗”，既然如此，建筑已毁，防水设施自然消失，河水“侵啮”，势在必然。宗翰用改拨河道的办法从根本上清除了武州川水对云冈石窟的永久危害，确有远见卓识。今实地考察云冈的现状与《金碑》记载相符。现武州川水（今十里河）河道已南移百米左右，河道改道长度约1000—1500米。整个改拨河道工程动用和挖掉的土石方是巨大的。三千人施工，最少也得半年之久方可完工。“烟火司”检遍《金史》不见有明确记载。《金史·卢窟伦传》记：“天会二年（1124年），知新城事。

……改静江军节度留后，知咸州烟火事”此例说明烟火之事本应是宋人使用的一种土火土炮，后来被女真人效仿而在军中设置了“烟火司”，相当于今日之“工程兵”，恐怕“烟火司”大多数也是由宋降兵、下民、方伎等所组成，战时打仗，平时生产。对此《金史》都漏记，《金碑》则补之。

3. 对“皇统工程”的考证。

金代云冈石窟“皇统工程”（即“内修工程”）是云冈石窟外护工程的继续，是金代统治者崇佛弘法的标志之一。此项工程是皇统初年（1141年）奉金熙宗圣旨开始筹划，到皇统三年二月（1143年）正式开工，再到皇统六年七月（1146年），完工前后达六年之久。

金熙宗是金代倡导佛教的皇帝之一。他曾派名僧海慧大师（？——1145年），到上京建立了大储庆寺，他广接名僧，弘扬佛法，并开始了金刻本《大藏经》的工作（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开始），也就是说“金藏”的刻印是紧接着云冈石窟的“皇统工程”之后进行的，由此奠定了金熙宗（女真人）对我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

金熙宗执政时期虽然是金代的“盛世”，然而从《金碑》的记载推敲，云冈石窟“皇统工程”其经费基本来源于民间的布施和稟慧法师奉圣旨出面的化缘。

“皇统工程”的全部内容包括“灵岩大阁九楹”，即今云冈石窟第三窟前木构建筑和其他窟前木构建设¹³。《营造法式》说：“柱：一曰楹，二曰柱。”第三窟前在金代曾重建过大的楼阁式建筑，其工程是宏伟壮观的，从今天三窟窟壁上的椽柱眼的痕迹中可以受到启发和推想。“门楼四所”是指东、西各一门，正门里外门（即南门）。“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此二十间新屋似乎大致应在今日云冈石窟的四、五、六窟前边。“又创石垣五步余步”，从今天云冈出土的沟纹砖等

遗迹上推断，石垣墙应是云冈石窟东西边的院墙，这样，金代云冈石窟东西有院墙，有门楼，中部有佛殿、佛堂、新旧配屋相连接，自然形成一个整体。

云冈石窟的金代建筑已经全毁无存。我们从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圆满大师重新修建的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宝殿、普贤阁、三圣殿和天王殿¹⁴，天眷三年僧录通悟大师重修的大同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天会二年（1124年）建的山西应县的净土寺以及皇统三年（1143年）建的山西朔县崇福寺等现存的金代建筑去想像当年金代云冈石窟寺院的建筑风格、水平和规模等。可以说金代重建后的云冈石窟寺院仍然是雄伟壮观的。

4. 对稟慧大师的考证

从《金碑》所知，金代在云冈石窟修建工程（即“皇统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是稟慧（惠）大师。稟慧，俗姓王，汉族无疑。弘州永宁人（今河北省阳原人）“弘州，下，刺史。辽名军曰博宁，本襄阴村，统和中建。”“弘州城：蔚州西北九十里，汉为代郡”¹⁵。“阳原县地，后魏置长宁县，隋改开阳县，唐为安边郡，辽置弘州”¹⁶。阳源金代归属西京路，大同府管辖。稟慧大师能成为云冈石窟住持并负责金代工程不仅与他的学识等有关，还可能与他的出生地有关。他从小出家受具于天成县幽峰院，天成县今山西天镇县，幽峰院暂不可考。“天成县，辽析云中置”¹⁷。金代归西京路大同府管辖。“天成，‘成’原作‘城’”¹⁸。《金史·苏保衡传》云：衡，“云中天成人”。稟慧大师十八岁便能精通《华严经》、《摩诃演论》等经，一举成名，说明天成县幽峰院应是当时名僧荟集的名寺院。《华严经》原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华严宗信奉的主要经典。华严宗供奉华严三圣，即中尊为毗卢遮那佛，左为普贤菩萨，右为文殊菩萨。《华严经》宣传的是“顿入佛地”的大乘思想，《摩诃演论》原名《摩诃衍论》是《起信论》

之异名。《起信论》原名《大乘起信论》，为马鸣菩萨所作。《起信论》同样宣传的是大乘思想。可见禀慧大师一生信奉和宣传的是大乘思想。金天眷三年（1138年）他已奉圣旨传菩萨戒，成为金熙宗的御用僧人。三年后，他又奉圣旨化缘并主持了修建云冈石窟寺工程。由此可证，金代云冈石窟修建工程基本是皇家工程。可工程经费却又主要来自民间，这也是金代佛教发展的一个特点。据《大金国志》卷36云：“僧录、僧正、帅府僧也，皆择其道行高者，限三年为任，任满，则又另择人。”禀慧大师确系“道行高者”。

禀慧大师“自幼明悟”、“威仪端重”，不仅精通佛学，而且又懂建筑，善理财务、学识较渊博，应是金代高僧之一。

5. 对曹衍的考证

由于资料所限，只知曹衍为河南开封人，其他事迹暂不可考。从碑文上推断，曹衍是通晓佛法、擅长文辞的儒士（或居士），这是无疑的。曹衍与禀慧大师早有往来，且关系甚好，曹衍此次北行云冈撰书《金碑》应是受禀慧大师的邀请专程来云冈的。《金碑》既然是“曹衍记并书”，说明曹衍颇具书法功底，因此，曹衍又应是金代一名书法家。

三. 金代云冈石窟修建工程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金代云冈石窟工程的初步考证，我们可获得启示如下：

1. 女真人信奉佛教其来源较早。“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迺好佛”^⑩。“金之先，出靺鞨，靺鞨本号勿吉……元魏时，勿吉有七部”^⑪。这些记载说明女真人奉佛应主要是源于北魏和高丽。女真人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历史是较长的。

2. 金熙宗是金代最崇信佛教的皇帝之一。西京作为金代陪都、佛教圣地之一，云冈石窟作为金代皇家工程之一，金熙宗实际考察云冈石窟是可能的。

3. 《金史》并未记载粘罕崇信佛法和保护云冈石窟之史实和其他史实，《金碑》的记录可补《金史》之不足。

4. 从《金碑》的记载可知，金代在云冈石窟的修建工程主要内容仅仅是土建工程，改拨河道等外护工程，是否对雕像作过补雕或彩画，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可能性较小。那么金代对云冈石窟的保护态度较辽代是严肃谨慎的。符合史籍金代“奉佛尤谨”的记载^⑫。

5. “金代以治华严学著名的高僧，有宝严、义柔、惠寂和苏陀室利”^⑬。从禀慧大师的业绩上看他也应是“金代以治华严学著名的”高僧，而他的名字事迹不见《金史》和其他史籍的记载，《金碑》对他作了简要介绍，可补中国佛教史特别是金代佛教史之不足。故《金碑》是研究金代政治社会历史佛教文化生活和地方史以及云冈石窟兴衰历史沿革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值得学术界格外重视。而天会九年获“通慧大德”号的云冈石窟住持沙门也应是金代一位高僧。

6. 曹衍作为金代文化名人和书法家，也不见史籍记录。在研究金代文化史中曹衍应是值得注意的人物。

7. 《金碑》出现了“唐堂帖”一词。帖古有“军帖”、“府帖”等。帖在金代有好几等，现知有：“唐堂帖”、“进奏帖”、“中都流泉务帖”等^⑭。《尔雅释宫》云：“庙中路谓之唐”。“唐堂”应是宰相府之帖。关于金代之“帖”需继续搜集探讨。

8. 金代僧官制度有僧“禅紫衣”的赏赐，实则来源于唐代，而唐代又始于则天朝。“大唐三年僧惠崇赐紫袈裟”。“传记，僧史略曰，则天朝僧法朗等赐紫袈裟，僧之赐紫自天后始。”金代佛教文化受唐代佛教文化之影响深远矣。

9. “提点僧”一词，辽金现存碑文中多见，此系俗称，而非宗教职衔。意同后人所

说的“主持人”或“督办”等。《金碑》所记“特赐提点僧禅紫衣”，等于说赐“工程负责人”次“紫衣”等级。如辽大安七年泰州建塔题名残石（通称“大安七年残石”）记：“大安七年岁次辛未，纒首西头供奉官泰州河堤□。同建办塔事弟右班殿直□。提点塔事前管内僧政讲经沙门□。”（陈述按：纒首、同建办塔事、提点塔事……均属建塔邑令头目人）又如：辽刘湘造经题记：“大契丹国重熙十年岁次辛巳七月戊申朔十日，给事中知涿州军事刘湘提点书纒”^⑩。再如：金承安四年道士碑记：承安四年五月初五日太虚崇道邑纒首提点郭彦温立石”等等，都可作为参证。“提点”，据《金史·百官志》属“正五品”。由此可见，金代主持维修云冈石窟工程的“提点僧”，其地位相当高。

10. 云冈石窟的金代建筑工程必然是女真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的结果，而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便是宗教文化。这是民族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特点。雁同地区成为今天我国重要的旅游区之一理所当然有古代女真人的贡献。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光彩夺目，享誉世界，是中华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这就是历史的结论。而云

冈《金碑》所反映的金代以前云冈石窟的兴衰历史过程和金代的修建工程正是对这一历史结论的最好说明。

-
- ① 拙著《云冈石窟的辽代修建工程》，原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89年第2期。
 - ② 详见《析津志辑佚》
 - ③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北京大学学报》1965年第1期。
 - ④⑦ 《金史·宗翰传》。
 - ⑤⑥ 《金史·太祖纪》。
 - ⑧ 《续资治通鉴》卷94。
 - ⑨ 《金史·宗翰传》，而《金史·熙宗纪》却记曰：天会十五年“七月辛巳，太保、领三省事、晋国王宗翰薨”。
 - ⑩ 赵一德：《云冈“十寺”的兴废沿革》（手稿）。
 - ⑪ 朱弁撰《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
 - ⑫⑭ 《金史·地理上》。
 - ⑬ 胡文焯：《云中郡志》。
 - ⑮⑯ 《金史·世纪》。
 - ⑰ 《大金国志》附录一。
 - ⑱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一册。
 - ⑲ 《金史·百官志二》、《金史·百官志三》。
 - ⑳ 宋人潘自牧《记纂渊海》卷184，详见《代宗实录》和《事物纪原》。
 - ㉑ 陈述辑《全辽文》。